

# 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旨趣

□赵兴虎<sup>1</sup>

(1. 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伴随着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数字时代的到来, 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着向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契机。数字将从理念、技术等层面进一步赋能驱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运用数字信息技术提高治理的效能, 以数字化、智能化推动形成科学高效的国家治理格局, 有待于从内在逻辑、现实境遇和实践指向三个层面深入剖析。从内在逻辑来审视, 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本质规定下, 基于数字化背景创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维理念和方式手段, 既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作出的深入思考与应对, 也是对数字化生存中国国家治理需要的满足。从现实境遇来看, 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理念、主体、体制等实然层面仍然与应然状态存在一定的差距, 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所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在实践指向维度上, 只有准确把握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趋势, 充分运用大数据和智能化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和水平,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维模式、技术手段、体制机制的创新, 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朝着精细集约、转型升级的深层次方向迈进。

**[关键词]**国家治理; 内在逻辑; 现实困境; 实践指向

数字信息技术的更迭推动了数字时代的发展, 从而推动了社会生活和资源配置的变革和重塑。从网站、电子邮件更新到现在的脸书、推特, 再到大数据、机器学习, 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正推动互联网到大数据阶段的迭代转型。数字时代的到来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最大的机遇就是治理方式的转变革新。当前, 公众已不再只局限于物质实体进行自身利益的表达, 而更多的是借助网络虚体以满足自身参与利益表达的需求。上网浏览新闻及时获取相关信息, 参与相关政治表达已成为数字时代公众参与国家治理的一种

常态。如何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 如何满足数字时代公众的利益表达需求, 这一系列问题成为实现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目标所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与社会治理的机制, 推进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模式创新。”<sup>[1]</sup>这也为数字时代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奠定了发展基调。

## 一、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出场语境

我们所处的时代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之下正发生历

作者简介: 赵兴虎, 男, 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党委书记。

史性变化，数据化、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是数字时代的重要标志和特征。“数字时代”概念的定义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内涵。阿尔夫托夫勒将信息化社会所带来的时代变化称之为“第三次浪潮”，尼古拉·尼洛庞帝认为人类社会已进入到“后信息化社会”，并提出“数字化生存理论”，帕特里克斯·邓利维将“后信息化社会”称之为“数字时代”。数字时代概念的提出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已标明社会发展已进入知识经济阶段，数字时代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首先，数字时代政府功能面临的挑战。数字时代民众利益诉求表达的方式更加自由多样，要改变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发展功能，真正实现以民众为中心。而以民众为中心发展目标的建立，需要政府及时转变自身功能的方向，由“管制”转变为“服务”。依托数字技术的优势，政府部门要分别重塑政府与企业、民众之间的关系，实现政府服务的转型升级。其次，数字时代政府组织结构优化面临的挑战。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政府组织的建设要求在各级政府之间建立统一的网络服务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减少政府组织间的中间环节，从横向与纵向层面实现政府之间的沟通，使政府真正成为一个管理的有机体。此外，通过数字技术的运用，可将原本分散的权力组织协调统一起来，通过网络来联系各级政府与其相应的权力，实现权力的集中统一，从而推动政府更加有效地协同统筹。对于政府工作人员而言，通过数字网络的建立，可将工作人员的知识信息与智能服务有效结合，从而能高效处理一些非程序化且复杂性更高的事务。最后，数字时代政府运作方式面临的挑战。数字化对政府工作方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电子政务的建设。在数字时代，政府要及时实现“一站式政府”的转变，使政务服务真正面向公众，实现政务服务与数字技术的高度融合。

数字时代的发展所带来的并不单纯是数字化变革，而是一个数字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的整体运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关键环节是实现国家治理与数字技术的融合。而在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的进程中，数字时代为我们带来的不仅是挑战，更

是促进发展的巨大机遇，即数字化赋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只有明晰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深入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中的现实困境，才能阐明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核心与实践路向。

## 二、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伴随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出现，人们所生存的社会不管是从形式还是本质上，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信息社会，而是呈现出越来越多，且更为鲜明的数字化特征。数字技术在推动社会进入数字时代的同时，也在更大程度上提升了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增速，使其在未来几年时间里能够保持10%~15%的发展增速。大数据已渗透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人们的衣食住行与社会交往活动都离不开数字信息。基于现实社会发展进步和信息技术实践迭代，从数字化来考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变革转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时代化所要观照回应的重要议题，也是数字时代对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新机遇新挑战的深入思考与应对，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只有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充分突显数字化的显著优势，才能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

###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丰富发展的时代观照

马克思指出，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只是一种具有组织性的统治工具，“有产阶级、即土地贵族和资产者，使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不仅靠他们的财富的力量，不仅靠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且还靠国家的力量，靠军队、官僚和法庭。”<sup>[2]</sup>304 资产阶级社会地位之所以得到巩固的重要保障是由国家所提供，而此时的国家则是作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有力工具。“市民社会的所有要求，都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sup>[3]</sup>只有通过法律的形式，人民大众的基本需求被上升至国家意志的地位时才能够被满足。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建立属于自身的国家机器，才能彻底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sup>[2]355</sup> 马克思还系统论述了无产阶级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与方式，其中包括“社会的代表”“议行合一”原则与“议会式”模式、国家与教会分离等等。<sup>[2]358</sup> 恩格斯同时也指出，“从某一阶级的共同利益中产生的要求，即由这一阶级夺取政权，并用法律的形式赋予这些要求以普遍的效力。”<sup>[4]</sup>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基本的价值遵循，并且明确了方向目标。

在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要义的基础上，深刻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内涵全面认识和回应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变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不仅能够深化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背景下国家治理的理论逻辑，也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时俱进、丰富发展的时代观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国家学说规定了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和原则方式，运用数字化资源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建立以大数据为支撑的国家治理决策机制，不仅能够创新国家治理现代化，而且能够增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时代性和指导性。

## （二）现实逻辑：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机遇挑战的思考应对

国家治理现代化涵盖了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手段现代化等多个方面的具体内容。数字时代的到来，对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再次重构。目前，人类社会正处于全方位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深刻变革之中，国家治理面临着数字化技术转型的机遇和挑战。数字化技术在信息统筹、数据分析、资源共享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创新国家治理的路径手段，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运行效率，具有科学、高效的价值意义。尤其是在政务处理、正处于信息化与智能化转型的时期，对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数字技术正在发展成为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结构变革的内在动力。这些新兴的数字技术不断进行着融合，革命性与创新性、颠覆性与渐进性并行发展，对国家治理的运行逻辑进行着重构。

数字技术在重塑社会形态与经济运行模式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在为人民群众提供各种便利的同时，数字技术也对传统意义上的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实践构成了一定的挑战。数字时代的“特殊标签”如知识、技术、信息与数据等新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支撑，该模式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通过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虚体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并且呈现常态化的发展态势。各种不同的价值网络充斥于该共同体内，以此重新建构经济发展的蓝图。新兴主体的兴起，对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我们要对新兴主体予以支持并不断激发其内在活力，另一方面，也要对其加以规范与引导，以免触及公众利益的底线。我国已进入数字时代，各种新兴技术不断涌现，这便需要我们认清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与新的发展阶段，对新兴技术手段广泛与合理运用，以此提升国家治理的科学性、精确性。

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既要对新模式与新业态构建过程中出现的治理缺位进行及时完善，也要加快推动核心数字技术的运用，提升国家治理数字化水平。只有通过对数字技术的充分运用，才能对社会资源配置进行不断优化，达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效果，化解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矛盾，国家治理的创新活力才能被激发与释放。

## （三）实践逻辑：数字化生存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

数字时代的到来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数字社会的社会形态，存在于数字社会之中的个体已被数字化元素所影响，人的各种行为活动离不开数字技术，购物、工作乃至旅游，只需一部可上网的手机，便可在数字社会中生存。换言之，人的行为活动也在不断生产数据、信息，通过数字技术的运用把这些数据与信息汇集成数据流，并为社会运行与社会治理奠定一定的基础。数字时代所呈现的各类技术元素不断融合至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对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数字化元素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数字技术对人类生活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如基础信息的数据化。基础信息涵盖人口、财产与物产等方面的信息，

它对国家治理效能产生直接的影响。各类数据库的建立,将个体的身份信息、房产信息等纳入其中,国家通过对这些基础信息进行大数据处理,对人口进行精准识别,从而提高国家认证能力。随着数字技术的推进,智能手机与网购平台的出现,极大程度上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数字网络之中。不同用途APP的广泛运用,用户的不同信息如地理信息、身份信息等都会被数字终端所记录与进行数据化处理。对于企业而言,则是通过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平台,为不同用户提供不同的个性化定制,及时有效地满足用户需求。微信、脸书、QQ、腾讯会议等不同的社交媒体为人们进行线上社交提供了数字平台,及时弥补了线下交往方式的不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信息可通过网络平台进入终端平台,最终形成社交大数据,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具有价值的数字资料。此外,国家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可对人口流动等相关信息进行及时监控,在数字平台的监控下,人口流动汇集成海量的大数据,使各地区与各行业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交往活动日益紧密。

当下,社会运行呈现出高度的数据化,生活于数字时代中的个体以数字化生存的形式而存在,每个个体都是可移动的数据集,整个社会是由数字技术所联结的高度互联的数字化社会体系,个体与社会之间也变得日益透明。数字化社会为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社会基础,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的数字技术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对数据的搜集、分析与管理成为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作为我国发展的重要目标,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数字时代发展的新阶段,数字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国家治理所面对的各种挑战作出的主动回应。<sup>[5]</sup>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涵盖经济、政治、文化与生态文明等不同领域的治理现代化,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撑与能力保障。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已取得大量的创新实践成果,形成了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格局。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才是国家治理的根

本主体,共产党才是正确的领导力量,党领导人民以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对国家进行治理。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它是提高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有效性的必然选择。

### 三、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

世界形势的发展变革、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与国家治理的日益复杂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发展的历史机遇,但是同时也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造成了一些阻碍因素。这些因素的存在与发展变化成为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 (一) 国家治理的理念与数字化转型有待深入融合

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作为坚实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与实践探索。由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客观存在,任何理论注定都只能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的具体的历史的产物。换言之,任何理论都只是对一定时期社会发展阶段的反映,它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反映与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sup>[6]</sup>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国家起源、本质属性及其历史使命作出了科学分析与预测,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sup>[7]</sup>,从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治理的部分预测是没有建立在人类社会实践基础上的,更多呈现的是预测性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形成以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的现实状况为现实基础,并作出一定的预测,但未真正处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所描述的时代背景之中,因而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内涵,但政治只是这一相互交织整体中的一部分,难以将政治以及隐藏于其中的国家属性单独作为一个特定的对象进行系统且深入的建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架构在经济基础之上,而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变化,从这一视角出发,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数字时代中国的治理实践

未能完美契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未能与数字时代内在的发展要求相适应，未能建立满足国家治理新需求的理论框架。因此，在数字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形成了一定的挑战。

## （二）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权益表达方式有待深化

我国经济的发展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得到了显著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升，人民的权利公平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从而提高了自身对政治的参与程度。处于数字时代中的人民群众早已不再满足于对衣食住行的简单需求，而是更大程度上希望能广泛参与到政治实践之中，但在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人民的主体地位并未得到更大程度上的凸显。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人民群众可依托数字设备或数字渠道进行自身利益诉求的表达，既拓展了群众利益表达的渠道，也简化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必要的程序与步骤。但在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方面，国家还应继续畅通现有利益表达渠道，对其进行法律监管，使公民能够合法利用数字渠道进行利益诉求表达。而随着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被逐渐分化，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也呈现出较大程度的差别，目前国家治理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完全整合这些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一部分群体未能及时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减弱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性，现有的国家治理模式难以使之最终平衡。此外，国家治理体制是以科层制作为基础，更加倾向于集中行政权力，对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缺乏一定的保障，在治理过程中人民主体地位未得到重视与凸显，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应，这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际开展构成了一定的困难。

## （三）数字政府治理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

数字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与政府治理方式融合的产物，它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走向，是以政府治理变革为发展基点，旨在创造覆盖范围更为广泛的共同价值。数字政府治理有助于强化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的能力。但我国数字政府治理目前整体处于中级发展阶段，复杂的社会结构与网络环境相互

交织，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相互冲突，现有管理体制与法律体系之间并不完善，这些客观因素的存在对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形成了较大的冲击。首先，在数字政府治理中，缺乏恰当的机制，导致部分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只为追求所谓的政绩而将治理问题置之不顾。在政策法规方面，与数字政府治理有关的规范性文件与政策性法规相对较少，未能形成统一的规范，以至于在治理问题的实际解决过程中未能得到法律的保障。其次，数字政府治理实现了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转变，而部分地方政府却对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重视程度不够，对数字政府治理的认知结构存在偏差，尚未认识到多元主体参与数字政府治理的紧迫性、重要性。正因如此，致使多元主体参与数字政府治理的积极性较低，理性参与和主动参与的意识较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机制的效能未能得到全面发挥，催生了新矛盾与新问题的产生。第三，在人才培养方面，数字政府治理的专业化人才的培养有待进一步加强。在人才引进、培养及激励机制方面尚不健全，部分地方政府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不够，难以留住专业化人才，导致数字政府治理工作停滞不前。而针对现有的数字政府治理专业人才而言，其专业素质有待提升。数字政府治理人才的服务意识与治理理念未能真正落实到位，进而无法满足数字时代数字政府治理的需求，无法切实解决治理过程中存在的新问题、新矛盾，未能将创造与维护、增加公共利益作为工作的首要目标。

## （四）全球治理赤字破解的数字中国建设有待增强

新世纪以来，我国积极运用数字技术提升治理能力，并将数字技术融入至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各个方面。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数字时代成为基于信息传递扩散的多元化治理工具充分发挥作用的舞台。但由于长期不合理的国际治理模式的存在，使得解决“公平正义赤字”成为全球治理过程中的治理焦虑，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为了顺应现代化的时代主题，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进入科学轨道，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制度支持。消除全球治理焦虑的有效路径在于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二者之间似乎是以国际国内作为分界。正是由于这种错误认识的存在，导致长期以来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对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缺乏整体性的认识与统筹性的思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当今世界与中国都要面临的共同矛盾与困境。资本全球化的扩张使国家对资源的争夺、分配现象不断加剧，不同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依然存在。对中国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已处于社会改革转型的关键期，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依然是中华民族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在当今多元主体共存的国际国内治理格局中，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意识形态的斗争都未能得到真正有效地解决，反而在多元结构日益复杂的当下变革愈演愈烈。只有充分重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中国的重要地位，彰显中国治理版本的中国智慧，正确处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内在关联，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动态环节，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共赢的治理目标。

#### 四、推进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指向

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层面的问题，也是一个实践层面的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不断变化与调整的动态过程。国家治理目前正处于数字时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重要环节。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理论基础，以彰显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中国价值，以把握数字政府治理作为发展走向，以树立共同体治理作为发展目标。

##### （一）丰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已进入新时代，国家治理也已进入数字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早已过时，而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仍然需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作为指导，作为对新问题与新情况的理论回应。只有从更为具体的现实关怀入手，在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马

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才能发挥真正的指导性作用。“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先导。<sup>[8]</sup>”这足以彰显理论创新的重要地位与价值。因此，在准确分析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之上，在深入分析世界形势变革的前提之下，我们应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紧密结合，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营养成分，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内涵，以便于更大程度上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首先，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实现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在于要长期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不断发展与完善。不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而保证人民群众能够通过不同的途径与形式主动参与到国家治理工作中去。其次，要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进程中实现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保障人民群众依法享有政治参与的权利。此外，还应实现协商的广泛性与制度性。最后，实现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还应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进行。一方面要继续巩固宪法的根本性地位，以宪法为核心实施监督，扎实推进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与依法立法的工作，从而维护宪法的权威。另一方面，要对公正文明的相关标准进行严格规范，积极打造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

##### （二）彰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价值：以人民为中心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总结说：“公社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sup>[9]</sup>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蕴含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同时这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彰显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价值。因此，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原则贯彻落实至推进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只有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立场，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我们才能扎实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工作。只有这样，

才能避免走上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资本本位的治理模式，才能避免重蹈以苏联为代表的国家全能主义的治理模式。

国家治理从价值维度上可被理解成为一种价值治理。在推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过程中，要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取向。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从而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所在，是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国家治理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呈现出一种具有中国价值底蕴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八个明确”与“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之一，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要求将其贯彻到国家治理的实际活动之中。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始终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前进的根本价值理念。

以人民为中心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引领，我们必须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水平，实现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要从理论维度上不断凸显国家治理主体的人民性。要充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始终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培养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主体精神，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要不断完善现有国家治理格局，凸显国家治理主体的人民性，使人民群众处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之中。其次，在制度维度上，我们要逐步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以制度构建作为有力保障，以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现代化国家治理体制的需求。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人民群众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在国家治理进入数字时代背景之下，我们必须破除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制度障碍，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转变，以制度建设、制度创新与制度优化为保障，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体系，为国家进步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最后，从实践维度上始终要以增进人民福祉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奋斗目标。要将以人为本始终作为检验

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成效的标准，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着力点与衡量标准。

### （三）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走向：数字政府治理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逐步推进数字政府治理，自此迈入数字政府治理 1.0 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由此开启了我国数字政府治理的新征程，标志我国数字政府治理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只有以数字政府治理作为重要走向，才能以政府治理为支点，创造共同价值。但不可否认，在我国数字政府治理的实际推进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现实困境。法制建设方面，数字政府管理的体系化建构与法制化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我国现有的管理体制与法律体系较为不完善、不完备，对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形成了较大的冲击。主体参与方面，数字政府管理的多元参与机制尚未能够全面发挥，部分地方政府对多元主体参与重视的程度不够，对数字政府治理演进结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人才培养方面，数字政府治理的专业化优秀人才缺口较大。

数字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具有良好的发展契机与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我国在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与问题成因，积极寻求突破路径。首先，应积极建构与完善与数字政府治理有关的法律体系。这既是信息技术革命下完善我国数字政府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同时也保障了我国数字政府治理水平。制度治理能力提升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sup>[10]</sup>一方面要注重以数字政府治理为核心的法制化建设。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托，党组织与相关政府部门应积极解决在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从而建构起可操作性较高的数字政府治理法律体系，如通过立法手段，积极协调与均衡数字政府治理资源，从而夯实数字政府治理基础设施，提升各级政府对数字治理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还应建立完备的管理体制。党组织与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数字政府治理的系统筹谋，加强总体规划与顶层设计，建

立起具有一定权威性与普适性的数字政府管理体制。其次，要不断升级与重塑数字政府治理的多元参与机制。多元治理主体在推进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是关键因素。为此，应重塑数字政府治理的现代治理体系。以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对电子公共服务供给进行不断整合，最终建构起多元主体参与、数字治理的市场化服务体系。如加大数字政府治理移动端的投入力度，实现微信、抖音等数字媒介与数字政府治理的有效融合，从而吸引更多的民众实际参与到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此外，还要及时对数字政府治理的现代经营模式进行升级，促进政企共同参与数字政府治理进程中，建立良好的新型运营模式，以此增强数字政府治理的活力。如积极发展数字技术产业体系，建立以自主研发为主、企业外包为辅的运营模式。最后，应加大对数字政府治理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国家与政府部门要不断完善人才引进政策，不断提升数字政府治理人才的福利待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适当降低人才引进的门槛，侧重于物质上的奖励。要高度重视对数字政府治理人才的培训工作，强化相关人才机制建设，激励数字政府治理人才能够进行自主学习。如定期开展培训活动，以此提升数字政府治理人才的业务能力。

数字化与信息化是数字时代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数字政府治理要不断创新数字时代的治理模式，充分利用数字时代优势，积极搭建具有统一性与共享性的基础数据平台。在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等政府治理实践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信息孤岛，尤其是在跨层级、跨地域与跨系统、跨业务等数据共享与流动过程中，为此，应打破信息孤岛背后的部门本位主义，对政府业务进行垂直系统整合，提升政府的业务水平。建立数字时代治理整体运作平台，不断进行信息整合，建立与完善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与合作机制，不断创新网络化公共服务模式。此外，由于数据时代数据库等有关技术虽存在一定的优点，但也面对潜在的数据丢失等风险，因此还应保障信息安全。所以应建立与完善互联网融合标准规范与法律法规，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对违反法规的行为进行及时纠正与问责，不断调整与更新公共服务的模式。

#### （四）树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共同体治理 国际数字鸿沟

马克思评价指出，“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sup>[11]</sup>国家的发展历程同样也是共同体的发展历程，从落后的原始共同体发展到虚假的共同体直到先进的人类自由联合体，在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存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共同体视域下国家治理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升级与发生质变的过程，从原始共同体治理到共同体治理，是一种不断继承与发展，不断摒弃与创新的客观发展过程。

共同体视域之下资产阶级国家的存在是以剥削社会关系为基础的阶级构成，而国家治理也相应地被理解成为以阶级组织为中介，作为统治阶级对国家的各项公共事务进行组织与管理，从而在不同的阶级之间分配不同利益的活动。资产阶级国家的国家治理未从生产关系源头矫正早已变形的社会格局，而只有无产阶级采取生产关系革命的方式，才能促进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共同体时代的国家治理追求的是生产关系的平等合作、社会成员平等相处、社会关系和谐无私。共同体治理的理想图景被马克思描绘成为：“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sup>[12]</sup>该图景已成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奋斗的方向。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方面是与现代化的时代主题相适应，另一方面则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制度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以中国为主导力量，对国际秩序进行重构的中国版本与中国智慧，因而无法避免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而在人类命运与整体性发展过程中，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是一种动态演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一致的政治价值根底与意识形态底色，二者存在耦合性的发展。在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篇”即国家治理现代化工作的同时，也应扎实推进其“外篇”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工作，以内治外，以外促内，以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应广泛吸收与借鉴人类

各国制度文明发展史中的优秀智慧成果，吸取先进经验，尤其是注重吸纳多元文化及多元种族并存的制度文明精华，以此改善我国包容性制度设计元素的具体实施运用。此外，在尊重各国治理主体多元并存的制度价值理念层面上，在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前提下，积极引入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治理的相关经验，借以发展国内治理的相关社会服务组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而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应及时提炼与总结国家治理多元主体结构，以及基层自治等治理方式方面的先进经验，并将其升华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从而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N].人民日报, 2017-12-10 (01) .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304.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258.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567.
- [5]孙肖远.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逻辑[J].江海学刊, 2019 (4) :149-145
- [6]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8-05-05 (02) .
-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91.
-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75-76.
-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40.
- [10]郑智航.关于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路劲[J].甘肃社会科学, 2019 (3) :36-44.
-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32.
-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95.